

李開軍 撰

陳三立年譜長編

上冊

中華書局



陳三立年譜長編

A Chronicle of Chen Sanli

上 冊

李開軍 撰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陳三立年譜長編:全3冊/李開軍撰. —北京:中華書局,2014.3

ISBN 978-7-101-09780-1

I. 陳… II. 李… III. 陳三立(1852~1937) — 年譜 IV. K825.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52500 號

-
- 書 名 陳三立年譜長編(全三冊)
撰 者 李開軍
責任編輯 俞國林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03½ 插頁 10 字數 1560 千字
印 數 1—12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09780-1
定 價 380.00 元
-

陳三立年譜長編



陳三立八十像

(見《青鶴》第一卷第三號)

沈哀入骨而出以深微澹遠遂成
孤詣陶令稱擺落悠談請從余
所之固有曠世而相感者耶戊
辰臘日三立讀



蒼虬夜課
抄甲子



1928年蒼虬夜課題詞

哭張庵師
 一擲者賢與世違猥成後死更何依
 傾談侍坐空留夢啟聖回天端見幾
 傑出精魂親斗極早彰風節動宮闈
 平生餘事仍難及冠古詩篇欲表微

1935年挽陳寶琛詩

(見王爾敏編《袁氏家藏近代名人手書》)

陳巖原所贈詩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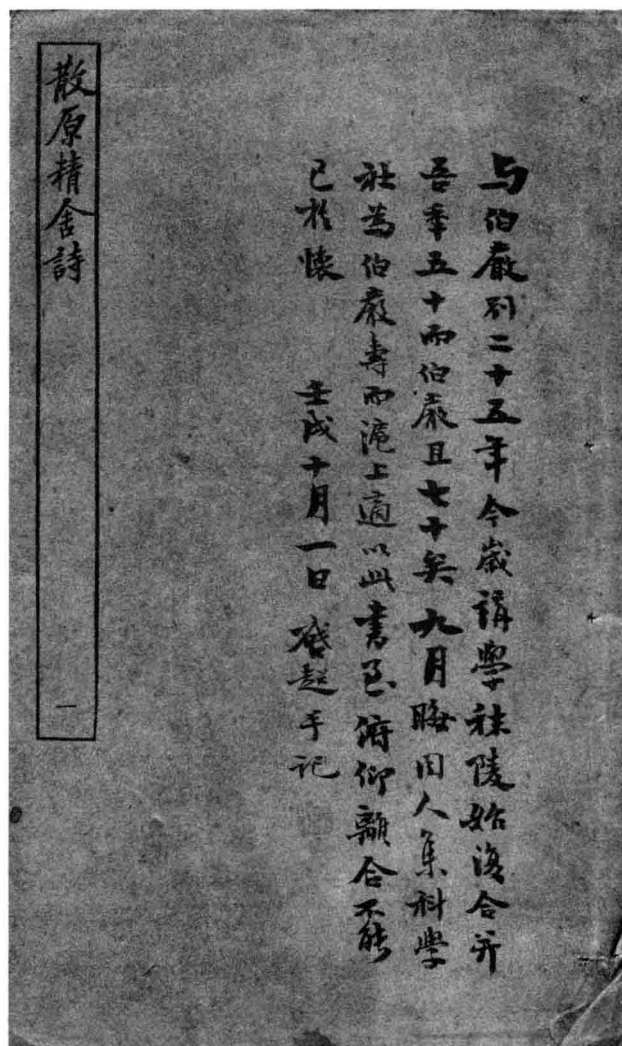
辟地貪逢隔世人
照星酒坐滿酸辛
舊游莫問長埋骨
大患依然有此身
開物精魂餘強聒
著書歲月託孤呻
六家要指藏禪密
待臥西山訪隱淪

任公大師講學白下及北還寫句為別乞教之陳三立



1922年贈別梁啟超詩

(見北京誠軒拍賣有限公司2010年秋季拍賣圖錄)



1922 年梁啟超題散原精舍詩

(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 出版說明

後期資助項目是國家社科基金設立的一類重要項目，旨在鼓勵廣大社科研究者潛心治學，支持基礎研究多出優秀成果。它是經過嚴格評審，從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選立項的。為擴大後期資助項目的影響，更好地推動學術發展，促進成果轉化，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按照“統一設計、統一標識、統一版式、形成系列”的總體要求，組織出版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成果。

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

郭 序

義寧陳氏，爲簪纓之族，書香世家，一門之內，三代卓傑。陳三立，承上啟下，爲中國文化、學術、詩歌之傳承者，在中國近代文化史和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陳三立(1853-1937)，是近代著名詩人，“同光體”領袖，汪國垣先生以“都頭領天魁星及時雨宋江”當之，可見他在當時詩壇的名氣和地位。陳三立在政治上又能與時俱進，1896年曾列名強學會，後幫助任湖南巡撫的父親陳寶箴(1831-1900)措置新政，網羅人才，頗有成績，湖南一時成爲“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01頁)。

陳三立一生中以詩名最著，他留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的業績也主要是其詩歌創作。對於他的詩歌成就同時代人多有論述，且評價甚高。“同光體”的詩評家陳衍說：“五十年來，惟吾友陳散原稱雄海內。”(陳衍：《石遺室詩話續編》)陳三立的詩確如具有深厚舊學功底又曾留學美國的近代學者胡先驌先生所云：“煙波浩渺，一望無際，非管窺蠡酌所能測其涯涘者。”(胡先驌：《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先驌文存》，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頁)

“同光體”在近代文學史上被視爲舊派，這是相對於詩界革命派而言的。但對於陳三立的詩，新舊兩派的詩評家均評價很高。舊派的評論家如陳衍、樊增祥、范當世等人自是讚不絕口，而像梁啟超、黃遵憲等新派人物對散原詩亦甚推許。梁氏稱其詩“醞深俊微，吾謂於唐宋人集中，罕見倫比”(《飲冰室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10頁)。黃遵憲評其詩“睥睨一世，橫掃千人”，又說，“神在詩外，意據詩頂。俯唱遙吟，不可一世”(潘益民、李開軍：《散原精舍詩文集補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頁、118頁)。由此可見陳三立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唯如此，陳三立又是近代文學史上的關鍵人物，他與近代許多詩人、文學家都有直接和間接的關係，研究他，對瞭解近代文壇至關重要。因此，對於這樣一位作家的研究就是不可或缺的了。

研究一位作家，我主張首先要認真研讀他的作品，即從整理、校點或注釋作家的作品開始；在此基礎上，要讀其書、知其人，即瞭解他的歷史、生平，

一般是編寫年譜。有了這兩步工作，第三步才談得上對作家文本（作品）的研究。如果有可能，在自己搜集資料和研究的基礎上，再為作家編一本研究資料集，這是第四步的工作。有了這四方面的工作，才大體稱得上對一位作家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我自己研究近代文學就是這樣做的（比如龔自珍研究、秋瑾研究）。李開軍是我的學生，跟我讀了六年書，他所走的研究路徑大抵與我的治學經歷相似。2002年，他獨立完成了七十餘萬字的《散原精舍詩文集》的校點（200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然後又開始了對陳三立生平及其歷史中若干問題的考證，比如有關陳三立父親的《陳寶箴“賜死”考謬》（刊《文史哲》2011年第1期）就是其中之一。他這部《陳三立年譜長編》的構思開始於十年之前，十年來教學之餘，夢繞魂牽的就是這部年譜。據我所知，開軍的這部年譜早在五年前就成型了。開始他未打算寫這麼長的篇幅，但材料越積越多，而為了尋找一條材料，他又不惜一切功夫，不錯過一次機會。2007年11月，我赴臺灣進行學術交流，臨行前開軍託我代他去臺北中研院查找幾條材料，大約有了這幾條材料，書稿就可以殺青了。誰知過了一年，2008年冬，開軍又電話告訴我（我當時在北京），他要來北京參加一個什麼拍賣會，因為在拍品中有陳三立的書札。一個青年教師如開軍，自然買不起這樣的文物，他說想在預展時來北京做些鈔錄。我當時以為此事恐怕辦不成，沒想到他的熱誠感動了拍賣公司的工作人員，竟然暗中給這個窮書生提供方便，使他得以在預展時拍回了書札照片。

開軍做學問的熱誠很讓人感動，他為了搜集相關史料，不惜時間、不惜精力，他除了利用山東大學圖書館和山東省圖書館所藏的書籍、史料外，還先後去過北京的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清史編纂處圖書室、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湖南省圖書館，以及臺北的中研院圖書館，只要是有一點線索，他總是窮追到底，絕不放過。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開軍確有這種精神。

開軍不論是教學抑是研究工作都非常刻苦，做學問低調，他埋頭於鑽研業務，不大計較名利，這是他的同輩人對他一致的評價。在學風浮躁、急功近利的當下，一個青年人能坐住冷板凳，十年磨一劍，這種腳踏實地的治學精神是值得稱讚的，也是值得青年學子學習的。

開軍做學問不滿足於現狀，總是想步步深入。比如他整理和校點的《散原精舍詩文集》，在當時也算是一部比較完備的詩文集了。但從該書出版之日起，開軍就意識到這部詩文集尚有遺漏，為此他費盡了心思：或繼續埋首於圖書館裏查找，或靠朋友的直接幫助，試圖尋找各種線索，進一步搜集陳三立的集外詩文。某一天，他看到孔夫子舊書網上有一位陳三立詩歌愛好者將《詩文集》未收入的作品貼在網上，於是開軍靈機一動，便將自己收集的

陳三立集外詩文也貼在網上供大家研讀，結果用網上交流的方式，收集到了若干陳三立的集外作品。最後與另一位有心人合作，於 2007 年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散原精舍詩文集補編》，輯補陳三立的詩文近五百題，總算完成了開軍編輯陳散原詩文集的心願。

今天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陳三立年譜長編》，一百五十餘萬言，可算是開軍研究陳三立的第二步工作。全書分爲十六卷，以豐富的史料逐年叙寫了陳三立的一生，文字翔實可靠，所用資料均注明原始出處，便於使用者查找、核對。這是瞭解、研究陳三立生平歷史的一部很實用的書。在此書即將出版之際，欣喜之餘，寫了以上的話，便作爲本書的“序”吧！

郭延禮

2012 年 6 月 1 日於山東大學

張 序

我和李開軍兄交往之前，已經和他的導師郭延禮先生有過數次親承謦欬的機緣。郭先生與我的導師管林先生，同為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界的前輩。無論是做人還是治學，兩位先生都有不少相似之處，都是我十分敬重的師長。2003年6月，開軍在郭先生指導下獨力校點的《散原精舍詩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拜讀了郭先生的“代前言”，我才知道他和開軍的師生關係，愛屋及烏，對開軍也頗多好感。

2004年4月，中國近代文學研究會在青島召開年會，我的同門師兄左鵬軍教授有意為我和開軍牽線搭橋，留下了我的聯繫方式。鵬軍兄回廣州後，向我談起開軍在會上發言時提到的四個心願——為散原編全集，為散原詩做箋釋，編一部散原年譜，寫一本散原與近代詩壇的論著。這四個雄心勃勃的計劃，既讓我吃驚，也讓我妒忌——我從1994年就開始做散原研究，除了一本《陳寅恪的家族史》、幾篇文章和一部未刊的《陳三立年譜》，從未有過如此完備的規劃。幸好在胡文輝、孫虎等友人的引導下，我很快關注了開軍與朱銘、劉錚等朋輩在孔夫子舊書網“書話交流”欄目裏的往復切磋，再三流覽，越發慨歎網絡的便捷，越發敬佩他們的無私，也越發感覺到自己的差距。於是，羨慕、妒忌的心思一天天消退，助一臂之力的想法漸漸萌生。

2005年1月4日，開軍主動給我發來了一封題為“問候”的電郵，二人一拍即合，自此訂交。同年6月30日，我用特快專遞將《陳三立年譜》寄給開軍，以示支持。從那以後，我和他圍繞著散原乃至義寧陳氏研究在資料上互通有無，彼此不客氣地修改對方的文章。直到2012年，我將十多年來研究陳寅恪的文章結集出版，在修訂舊稿、撰作新篇的過程中，開軍仍為我提供了許多關鍵的史料。可以說，他與胡文輝、馬忠文一樣，是我最重要的文字交。

談到我的那本《陳三立年譜》，與中華書局也有關聯。約在1998年前後，我將它寄往書局，想不到很快有了回覆，退稿信寫得很得體，只說為散原編寫年譜很有意義。當時沒有電腦，十三冊手稿二十五萬字，一字一詞全靠手工搜集而來，再一筆一畫地寫定、謄清。敝帚自珍，面對這樣的結局，難免

失落。在此之前，拙稿又曾寄呈錢仲聯先生求教，錢老賜復時，一秉其長者厚德，多獎掖之語而未作批評，只是強調《清詩紀事》已將散原資料搜羅殆盡，不能忽視云云。我知道稿子肯定有問題，但問題出在哪，卻不甚了了，失落之餘又多出幾分納悶。

等到2003年閱看開軍輯校的《散原精舍詩文集》，2007年翻閱潘益民兄與開軍合作輯注的《散原精舍詩文集補編》，尤其是2011年年底應邀校讀開軍撰寫的《陳三立年譜長編》（以下簡稱《年譜長編》），我這才明白拙稿的問題所在，這才徹底相信自己的安排沒有錯：開軍的見聞和積累，已經遠遠把我甩在了後面，他才是編纂散原年譜的最佳人選；對我而言，與其日後零星增補、局部完善，不如提前匯流成海、成人之美。

二

我前前後後花費九個月的時間，才看完了上百萬字的《年譜長編》校樣。在我看來，此譜最大的貢獻，是第一次基本釐清了陳三立與南潯鐵路（南昌至九江）的關係。

參與修建南潯鐵路，大概是戊戌政變後陳三立最重要的事功。在光緒三十年至民國四年（1904～1915年）的十餘年間，散原先生本人在詩文中對此的記載既簡略又隱晦，拙文《略論日資對南潯鐵路的滲入與壟斷》（載《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雖曾有所論列，但掛一漏萬，未得要領；《年譜長編》則真正做到了“內外兼證”，既破解了散原個人歷史的一大懸疑，也為近代鐵路史、經濟史、外交史等領域的研究貢獻了十分重要的新素材。開軍用作“內證”的材料，除了已刊的散原詩文，又多出陳三立致汪詒年書、致端方札等集外作品；而“外證”更為壯觀，除了將《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近代中國鐵路史資料》《交通史路政編》《郵傳部奏議分類續編·路政卷》等類編中的相關史料納入囊中，最讓人佩服的是能够下足笨功夫，從《申報》《中外日報》《南方報》《神州日報》《時報》《東方雜誌》等新聞報刊中鉤沉輯佚、拾遺補闕。內聯外合，多管齊下，以時間為經，以人事為緯，將不同背景下散原與南潯鐵路的喜怒哀怨作了全景式的展列。

僅就我個人的閱讀感受而言，站在開軍精心繪就的這幅“全景圖”面前，稱得上豁然開朗、心花怒放：“《南方報》復挺出，為之代表”（陳三立《與汪康年書》十九，見《汪康年師友書札》第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7頁）之類，肯定意有所指，但多年難覓答案，此番寥寥數行，瞬間參悟；而主持創辦鐵路銀行（1906年）、聘日人岡崎平三郎為贛路工程師（1907年）、為有無“借款賣路”情事與《中外日報》訟質（1907年）、江西留日學生具稟查辦陳三立“違章借款賄賣路權”（1908年）、因九江龍開河車埠地與日

本三菱公司交涉(1909年)、調停贛路公司內部“派股”“勸股”二派爭議之風潮(1909年)、南潯鐵路九江至萬宜灣段先行通車(1910年)、贛路因日人催繳大成借款而被迫改由郵傳部接辦(1911年)、江西都督李烈鈞取銷贛路公司前清關防(1912年)、贛路公司向東亞興業會社借貸日幣五百萬元(1912年)等等,更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一幕幕場景。猶有甚者,贛路公司的內外交困每每折射出變亂頻仍的時代風雲,宣統三年辛亥九月初五日(1911年10月26日)《申報》的一則報導《章江浪接楚江潮》,便形象地將贛路公司內部的“迭鬧風潮”與“鄂亂激烈”的外部背景進行了鏈接。於是,一個人,一條鐵路,一個時代,三者緊緊地扭合在一起,《年譜長編》的內涵也因此得到了豐富和提升。

《年譜長編》另一個較大的貢獻,是對散原作品從未間斷的增補和對外圍文獻最大限度的搜集。

文獻愈“近”愈繁,為近代人物整理全集、編撰年譜,經常遭遇新的煩惱:或層出不斷,難於窮盡,或材料太多,難於取捨,既考驗研究者的耐力,更考驗研究者的眼光。開軍積蓄既深,關注且久,頗有一種“咬定青山不放鬆”的執著,即便是等待我寄還校樣的這段時間,仍然沒有放棄對散原佚作的輯補。因此,無論剝蕉抽繭、鉤隱發微,還是辨偽糾誤、去蕪存菁,每有左右逢源、豁然貫通之樂,看似信手拈來,實則得來匪易。

《年譜長編》在《散原精舍詩文集》及其《補編》的基礎上,增收了許多新的詩文,其中一些可稱散原力作,寫於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的《清故太常寺卿袁忠節公神道碑銘》尤其值得關注。袁昶“負經世閱略”,持正不阿,“於利鈍險夷無所避就”。外侮憑陵,時勢艱虞,而朝野上下“嘗不審彼己,率狃於虛憍浮囂之習”,袁昶“思與同時賢達起而正之,益求濟變圖存之道,徐躋微弱於盛彊”。此篇剪裁精當,寄託遙深,意在“著其孤忠大節有繫國家存亡之故者,以訊於永永無極之世”,字裏行間又時時可見義寧陳氏之變法思想與精神追求。八旬老者,筆力遒勁如此,令人嘆服不已。

我所謂“外圍”文獻,以散原同時代人的別集為主,而又不局限於一般的詩文集,字畫、搨本、扇面、相片、報紙、雜誌等等無所不包,甚至連私家口耳相傳都涵括在內。這些來源廣闊的佐證,不僅增添小知識,有時還能解決大問題。試舉四例以證之:

例一,陳三立使用過的衆多字號中,“曼衍道人”、“冷紅龕主人”似未經人道及:前者有民國元年(1912年)釋寄禪之和詩《曼衍道人以詩見貽次韻奉酬》(載《海潮音》第二年第四期)為證,後者源自汪洛年民國九年(1920年)繪贈散原之設色山水扇面。

例二,陳三立之弟三畏英年早逝,弟婦張氏及其三個子女一直由陳三立

撫養，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陳家移居金陵，張氏也攜子女隨行。張氏目盲，以此才會有“鄭叔夜”（陳三立影射名）耽於吟詩誤入弟媳房中的笑話。此事在南京似早有傳聞，後被龍公寫進《江左十年目睹記》（文化藝術出版社1984年版，第25～26頁）。龍公此書，仿效“譴責小說”筆法，虛實混雜，真假難辨，不啻給使用者佈置了一道道迷障。開軍在《年譜長編》中雖未徵引此書，卻為“張氏目盲”找到了一條材料：光緒六年（1880年）七月，張修府（張氏之父）在《贈別陳公子三立並示女婿三畏》詩中曾有自注：“予女病目，久不瘳。”可證張氏係因久病而失明，並非先天目盲。由此進而言之，私家口述、小說家言，往往空穴來風，事出有因，區別只在是否敢用、善用。

例三，入民國後，散原曾多次列名各類社團，“保守者”有之，“先進者”亦有之，不乏與其“遺民”身份相衝突者，既未見其闢謠，又未見其活動。纍纍悶葫蘆，久懸胸中。《年譜長編》民國五年（1916年）所引李稷勳寄懷散原一律，自注有云：“癸丑後，余與散原先後被任為國史館修纂，均以久不到差免職。”李氏既同為當事者，所言自屬可信。開軍在囑我作序之後，又從《申報》覓得民國三年（1914年）任、免陳三立國史館協修的大總統策令。此一節，雖未徹底打破悶葫蘆，但足以令我恍然大悟，愈加明瞭吳宗慈《陳三立傳略》謀篇佈局之高妙——“以‘高不絕俗，和不同流’八字為骨幹”。

例四，作為陳寶箴最堅定的支持者與合作者，陳三立前半生的行事主要圍繞著父親的事功而展開，這也決定了編纂陳三立年譜必須對父子共同的事業予以足夠的關注，《年譜長編》於此也有充分的體現。比如，史延壽等纂修之《續武陟縣志》卷八、卷九，對陳氏父子所創致用精舍多有評介，正可填充拙編《陳寶箴集》相應附文之缺漏。而杜俞《采菽堂筆記》所稱“南皮於四覺老人，外委營務，使通賓客，以資察舉，內總文案，使之損益，便於商略，可謂位置盡善”，既可補陳寶箴留粵期間文獻記載之不足，又可見張之洞與陳寶箴主賓相得之誼，亦可證南皮、義寧主持新政之桴鼓相應誠可謂淵源有自。同樣在我閱讀校樣期間，開軍又從茅海建先生《張之洞與陳寶箴及湖南維新活動》一文中擷取數條檔案材料，“較杜俞之言愈益真切”。

三

長篇鉅製每每令人歎為觀止，也難免因為工程浩大而留下缺憾。我在校讀過程中，也曾向開軍提出一些商榷性意見。既然是“商榷”，所作批評未必符合開軍的原意，所提建議也未必較開軍高明，但他還是虛心地對相應文字做了及時補訂。受時間、精力所限，我未能再校閱此譜最後的清樣，因此，以下所提意見也許未必適用於正式出版的《年譜長編》，姑且算作我與開軍文字交往的又一次實錄。